

建構新臺灣認同，一次一建築—— 當代臺灣的日治時期建築

Re-constructing Taiwan's Identity, One Building at a Time:
Japan's Colonial Architectur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葛浩德 (Frederik H. Green) *

前言

自 1998 年起，這二十多年以來我斷斷續續到臺灣訪問、做研究、看朋友。每次到臺北，都順便觀察城市的變化。變化的確很大——20 年前有一個暑假我住在剛建立的大安公園附近，那時公園裡的樹都還非常小，但是 2018 年的秋天再去的時候，發現樹已經長得很大了。1998 年第一次去臺北時，臺北 101 一磚一瓦都還沒有，但是現在臺北任何一個地方幾乎都可以看到它了。那個時候，逛臺北有一點難度，因為需要先要搞懂公車時刻表以及如何換車。有了捷運後，情況改變很大。捷運徹底地改變了我們體驗臺北市的方式，因為它縮短距離且讓交通變得十分便利。另外一個很受歡迎的系統就是 YouBike。結合捷運和 YouBike，我得以探索許多以前沒辦法去或從來不知道的地方，尤其是跟日治時代有關的建築或地點。

我第一次感受到臺北市政府對推動日治時代的歷史建築保存的努力，是在 2013 年參加臺灣外交部安排的考察活動的時候。那時，政府代表帶我們去華山和松山文創區，給我們介紹建築的歷史和在日治時代的重要性，還指出現在各式各樣的新功能。2015 年我有機會在臺灣

國家圖書館的漢學研究中心待三個月，那個時候每天晚上圖書館關門後我騎 YouBike 到處探索，突然意識到好像到處冒出新翻修的、或正在翻修的日治時代建築。奇怪的是，既然是老建築，那以前應該早在那裡了，為什麼以前都沒看到、沒發現？是不是因為以前沒有人想讓我們看到，也沒有人讓它們凸顯出來。

那一年，南門的樟腦博物館剛開張，中正區重慶南路很多日治時代房子已經翻修得很漂亮，臺北撫臺街洋樓在 2014 年已經整修好，鐵道部和三井倉庫還被圍牆圍起，但是已經可以一窺新的容貌。當然不只臺北，全臺灣都有日治時代留下來被翻修過的建築，這些建築被改成博物館、商店、或私人住宅。我訪問一個清華大學的同事時，發現新竹翻修的日治時代建築也特別多，比如新竹州廳和新竹市美術館，還有影像博物館，日治時代稱為「新竹市營有樂館」，應該是日治時代臺灣第一家有空調的戲院。

因此，我漸漸開始對這些老建築的新角色感興趣。為何我以前從來沒有發現它們？為何這幾年越來越多日治時代的老房子被翻修且變得顯著？為何日治時的遺跡突然變得這麼受矚目？尤其是鄰近被日本殖民過的國家，比如韓國等，都好像沒有這種趨勢。我開始自問臺

* 作者為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現代語文學系副教授。

灣翻修日治時代建築的動機為何。我那個時候剛好在為新論文收尾，論文題目為「天下 KANO：魏德聖的『臺灣三部曲』裡的懷舊政治和臺灣新認同的創造」，是關於目前臺灣電影對日治的評價，討論臺灣對日治時代的輿論的變化，還有一個國家的歷史意識如何被重新鑄造。該文章的結論是說在目前臺灣所謂殖民地懷舊（colonial nostalgia）並不是一種盲目地贊同過去時代的表現，而是一個很複雜的文化論述，而通過這個論述臺灣人能辯論臺灣在全球化經濟的地位，臺灣文化的多元化，和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複雜關係。¹ 我所討論的三部電影中包含了描述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的電影《KANO》（2014）。《KANO》也談到建築和建設，亦即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我隨即考慮那個結論能否適用討論當代臺灣對日治時代建築的看法。

2018 年秋天，我很幸運地又有機會再次造訪臺灣，在國家圖書館的漢學研究中心進行研究。晚上騎 YouBike 探索的時候又發現日治時代建築的翻修好像更多了。這個發現令我回到原本的問題：這些經過翻修的日治時期建築在民間生活和輿論中扮演何種角色？日治時代建築的翻新，在當今臺灣身分認同上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為何？如果戒嚴時代蔣介石的去日化是為了強調臺灣文化的來源是中國，² 那當今的翻修是否就為了強調臺灣文化的多元性，也是為反對中國對臺灣的所有權的

宣稱？我馬上投入研究上述的問題，但是不久就發現因為對臺灣保存古蹟的歷史了解非常淺薄，所以研究內容比原想像的複雜而難下結論得多。在此先分享我的三個大錯誤，然後這些錯誤如何幫助我更深入理解臺灣對日治時代建築的評論。最後，再談論一些當代臺灣——尤其臺北——對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的輿論和當代德國——尤其柏林——的比較。我是在德國出生長大的，雖然後來移民到美國，但是仍然一直關注德國的變化。

讀者有可能會認為柏林和臺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市，但其實它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兩個城市都是比較近代才成為首都的。臺北是 1895 年日治後才成為首都的，柏林是 1871 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後才變成全德國的首都的。接著，柏林經歷了快速地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變成歐洲最摩登的都市之一，就像臺北，日治時代開始後也變成亞洲最現代的都市之一。臺北和柏林的建築都顯示了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流行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和新巴洛克（Neo-Baroque）建築風格。為了顯示新統一帝國的權威，柏林的建築採取了英、法反映帝國主義或美國那種新興國家驕傲的風格。例如，1894 年建成的柏林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就是以



（左圖）帝國國會大廈大會場（現今德國國會大廈 Deutscher Reichstag），建於 1884 年，（右圖）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現今國立臺灣博物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建於 1908 年

- 1 Frederik H. Green, "All under Heaven KANO: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Taiwanese Identity in Wei Desheng's Taiwan-Japan Trilogy," *Journal of East-Asian Popular Culture*, 3.2 (Fall 2017) 169-182.
- 2 Fu-Lai Tony Yu and Diana Sze Man Kwan,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ese versus Chinese Consciousness," *Social Identities*, 14.1 (2018.1) 38.

1876年美國建成的費城紀念館（Philadelphia's Memorial Hall）為範例。同時，日本明治時代建築受到當時在東京大學教書的知名英國建築家孔德（Josiah Conder）和其他西方建築家的影響採用歐美的設計，之後帶到殖民地。³ 因為柏林和臺北兩個城市都是新首都，所有政府機關的建築都必須新建。柏林和臺北有很多在這種背景下建造的例子，比如上述的國會大廈、1869年建成的紅色市政廳（Rotes Rathaus）和臺北1908年建成的臺灣博物館、1919年建成的臺灣總督府（現在的臺灣總統府）。更晚一點，從20年代開始，兩個城市都也變成建築現代主義的先鋒。柏林建築受到了新即物主義（New Objectivity）、包浩斯（Bauhaus）和其他的現代主義流派的影響，同時東京的建築家則推廣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現代建築。然後，年輕的日本建築家把現代主義風格帶到臺北。⁴

如果談20世紀歷史的動蕩，兩個城市也有相同的地方，而且建築也反映時局。雖然德國沒有被殖民，但是30年代卻被希特勒的納粹黨挾持，而且納粹政府用建築彰顯他們的權威和意識，就如同日本帝國之對於臺

灣、韓國或其他所殖民之處。⁵ 在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Olympiastadion）和財政部（Finanzministerium）都是此背景下的例子，在臺灣的例子則有以紀念昭和天皇登基為由而興建的臺北公會堂（就是現在的中山堂）和日本勸業銀行臺北分行（現在變成臺灣土地銀行）。戰爭後，德國被分成東西兩部分，柏林也一分為二。西柏林的新建築跟隨西方流行建築風格，東柏林跟隨蘇聯的風格。1989年柏林圍牆被打倒，第二年兩個德國合二為一，跟臺灣解嚴時間點差不多。臺灣那時新建的建築不是功能性的西式建築，就是外觀強調中華文化的奢華建築，如圓山飯店。⁶ 然而本文的重點非建築的歷史，而是建築的後續發展和現在的地位，還有人民對這些建築的輿論。

我所提到的輿論就是從90年代開始，德國和臺灣的社會對過去的歷史展開新的看法，以及對如何解讀歷史有熱烈的討論。臺北和柏林兩個城市的建築明顯地代表歷史的軌跡，所以如何解讀歷史就關係到建築。本文的重點就在此。為了分析當代臺灣輿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會引用德國文化理論家惠森（Andreas Huyssen）



（左圖）紅色市政廳（Rotes Rathaus），建於1869年，（右圖）臺灣總督府（現今總統府／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建於1919年

- 3 凌宗魁，《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8），頁24-25。See also Yasuhiko Nishizawa, "A Study of Japanese Colonial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in *Constructing the Colonized Land: Entwined Perspectives of East Asia around WWII*, Izumi Kuroishi (ed.)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2014), pp. 31-32.
- 4 凌宗魁，《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頁51。
- 5 Yasuhiko Nishizawa, "A Study of Japanese Colonial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in *Constructing the Colonized Land: Entwined Perspectives of East Asia around WWII*, Izumi Kuroishi (ed.), pp. 31-32.
- 6 Joseph R. Allen, *Taipei: City of Displacements* (Seattl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2), p. 60.

分析當代德國人對統一後柏林的建築保存的研究。⁷雖然他的理論在分析柏林的情況，但是也非常符合臺北的情況。最後我會試著比較「解嚴後的臺灣」和「統一後的德國」的歷史解讀、雙方輿論對翻修歷史建築觀點的異同，並討論在當今臺灣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輿論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亦影響著臺灣人對未來的憧憬。

二

一開始真正著手研究，我就發現我原來的想法有很多是不正確的。最大的錯誤就是以為臺灣人對日治時代或者一般歷史建築的興趣是最近才開始的，而且是跟當下政治、兩岸關係、或目前臺灣認同輿論有關係的。一位同事建議我參考舊《漢聲》雜誌以獲取一般性的概念。我隨即造訪漢聲書局翻看舊雜誌，恰巧看到兩本相關的，一本是我出生當年當月的那期的，1975年（民國64年）9月，題目是「古蹟之旅」，是討論救援臺灣古蹟早期運動的專輯。另外一本是1985年英文的專輯，談的是臺南翻修古蹟的過程。我透過這些雜誌才了解臺灣要求保存古蹟的活動已經有很多年了，還有我看到一些重要支持者和活動發起人的名字，比如林衡道、夏鑄九和漢寶德，從而得知他們改變臺灣人對歷史建築認知的貢獻。⁸在圖書館翻那些先鋒者的書籍時，我還找到了很多李乾朗介紹臺灣建築的圖書，得知在臺灣保存歷史建築運動的起源和過程。

有趣的是，臺灣這個覺醒就跟歐、美、日的差不多同時期發生。在歐洲，在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後，人民

首先只想到重整家園，但到70年代生活安定以後，才想到歷史建築的問題。1973年，歐盟發起「歐洲建築遺產年」（Europe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Year），目的就是讓大家重視文化遺產的保留。歐盟遵循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UNESCO）的宗旨。而後UNESCO於1977創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確立哪些地點可以列入世界遺產。⁹雖然臺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而無法參加UNESCO的活動，但是還是跟其他國家一樣，開始考慮如何保存文化資產，而且臺灣的專家也跟國外專家保持交流，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在我翻閱過的1985年《漢聲》雜誌中，有幾則報導是關於去日本和美國考察的結果。¹⁰在歐洲，跟隨著Europe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Year，很多國家訂定了文化遺產保存法，而臺灣在1982年也頒布了《文化資產保存法》。¹¹

因為1982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偏好100年以上的老建築，所以還沒有包括日治時代的建築。¹²由1982年倒算一百年，即是1882，光緒七年，亦即日治時代開始前13年。如果觀點沒改的話，以今年2019年倒算一百年，就是1919年。總統府恰巧是1919年建的，剛好今年才能列入古蹟。1975年那期《漢聲》雜誌一個日治時代建築也沒提，可能有政治因素，也可能是因為當時很少人認為幾十年的建築就有保存的價值。比如，臺北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是1936年建的，在1975年還不到40年。早期的保存活動注重於閩南建築，但臺南赤崁樓或淡水的紅毛城等荷蘭和葡萄牙的建築也先後於80年代初被列入古蹟。¹³因此，當時學者和一般民眾

7 Andreas Huyssen,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吳美雲（總編輯），〈文化國寶專集（3）古蹟之路（上）〉，《漢生》1981.10: 18、30、70。See also Linda Wu (ed.), "Report on Tainan's Historical Landmarks," *Echo* 5.8 (1975): 22-23。

9 Christian Raabe, *Denkmalpflege: Schnelleinstieg für Architekten und Bauingenieur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 Introduction for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2015), pp. 11-15. 另參考：李乾朗，《百年古蹟滄桑：臺灣建築保存記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2017），頁30-33。

10 Linda Wu (ed.), "Report on Tainan's Historical Landmarks," *Echo* 5.8 (1975): 22-23.

11 李乾朗，《百年古蹟滄桑：臺灣建築保存記事》，頁128-129。

12 Jeremy E. Taylor, "Reading History Through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aiwan" in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o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69.

13 李汾陽，《文化資產概論》（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0），頁73。

開始質疑為什麼日治時期所建的公會堂或是總統府不能指定成為古蹟。¹⁴

我做此研究的時候，有機會訪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林滿紅教授，她跟我談這個改變輿論的重要例子，亦即桃園神社。¹⁵ 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神道教被定為日本的國教，所以神社有濃厚的政治意味而無法和日本帝國切割。¹⁶ 因此，國民黨接收臺灣後很多神社被拆除或者被改成孔廟，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1901 年在圓山建立的臺灣神宮（前身臺灣神社），其為臺灣日治時期所建的神社中最為重要的一座，日本戰敗後即被拆除，後來在此地建立圓山大飯店。其餘神社在 1972 年日本和中華民國斷交後盡被系統化搗毀。¹⁷ 桃園神社建於 1938 年，二戰後國民黨政府將之改為桃園忠烈祠。1985 年時縣政府一度要將它拆除，後經輿論及學界的強烈反彈，最後決定整修，並於 1994 年被指定為國家三級古蹟。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年輕一代希望保存完整的歷史，而不是只有偏見的片段。

三

2018 年秋天我訪臺時恰巧北投溫泉博物館正重新開張，參觀時，我也得知有另一個這樣民主性的、由一般民眾發起的保存活動。博物館的說明指出，80 年代末北投國小師生因鄉土教學而發現了這座荒廢的浴場，要求保留並翻修北投溫泉公共浴場，1997 年終於經核定公告

為第三級古蹟。可知這樣的活動不是稀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並不是跟我所以為的政治概念、身分認同或兩岸問題有關的。這也是夏鑄九所謂的「取得草根社區之支持進一步結合民眾參與，與草根社會連結」的一個例子。¹⁸

這個發現也讓我意識到我第二個錯誤。我原來以為翻修日治時代建築重要動機是政治性的，而且跟中國大陸對臺灣的主權宣示有關，就是說中國強調臺灣的文化就是中國的文化，而臺灣想駁斥這種說法。但是一開始仔細地研究保存法的修改史，就發現動機和法律本身就有密切關係，而跟政治不一定有關係。1982 年剛建立的法律的一個缺點是，一旦建築被指定為古蹟就會給所有權人帶來很大的麻煩。法律只考慮到古蹟而忽略屋主的權利。所有權人不但不能開發土地，而且還是得付房屋和土地稅。1997 年修法，讓所有權人減稅，也提供維修補助金或提高容積率，如此大大提升屋主對所擁有的建築被列為古蹟的意願。如此修法不但有助於解決夏鑄九所提的「發展與保存之衝突」，¹⁹ 也提升大眾的參與感和建築物擁有者翻修的意願。²⁰ 原來金錢也是一個動機。

同時，保存文化資產的責任和訂定也由中央轉移給地方政府，讓社區自己決定哪些歷史建築是最值得保存的。2005 年再度修法，更增加或修改了對古蹟的分類和定義。一來鼓勵觀光客來訪，也可以符合某一個社區的需求，此外，更提升社區人民的參與感。²¹ 臺南林百

14 李乾朗，《百年古蹟滄桑：臺灣建築保存記事》，頁 101。

15 訪問於 2018 年 7 月 21 日在中央研究院進行。另參考：李乾朗，《百年古蹟滄桑：臺灣建築保存記事》，頁 149。

16 Akihito Aoi, "Transplanting State Shinto: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Buil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in Colonized Taiwan," in *Constructing the Colonized Land: Entwined Perspectives of East Asia around WWII*, Izumi Kuroishi (ed.), (Farnham, UK: Ashgate Publishing, 2014), p. 119.

17 Hoshihisa Amae, "Pro-colonial or Postcolonial? Appropri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Heritage in Present-day Taiwa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0.1 (2011): 21-29.

18 夏鑄九，〈臺灣的古蹟保存：一個批判性回顧〉，《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9（1998.12）：1-9。細節請參閱：胡志平，〈政府與民間機構於公共藝文設施的競合關係——以北投溫泉博物館為例〉，《建築與規劃學報》8.1（2007.6）：61-77。

19 同上註，頁 4。

20 Chen Chien-Chung and Fu Chao-Ching,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Taiwan—An Analysis Perspective under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The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Photogrammetry,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ume XL-5 (W7, 2015): 68.

21 同上註，頁 69。

貨是個好例子，其對觀光客，包括來自日本的，特別有吸引力，但是裡面賣的商品大多是當地的。²² 其中很多糖果、玩具還是文具，都是仿日治年代的，反映了 21 世紀消費者的懷舊喜好。²³ 2011 年位於嘉義和臺南間完成的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就是電影《KANO》裡的八田與一）是另外一個例子。因為八田與一建的水圳對當地的農民幫助很大，到現在為止還受當地人尊敬，翻修費也是由當地人捐獻的。²⁴ 臺北市大同、中正區由官方和民間共同合作翻修的日治時代建築特別多，比如民生西路於 1934 年建成、2016 年翻修後新開的新芳春茶行，²⁵ 還有重慶南路一段，外觀保留 1899 年日治茶舖以藝文空間為主題的星巴克。²⁶ 另外大溪老茶廠，是一個日治時代的茶廠，國民黨接收臺灣後本為國有，後來被廢棄，但是幾年前被私人公司翻修重新開張。

我 2018 年秋天繼續研究翻修日治時代建築的各種

各樣的背景時，有機會訪問當時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鍾永豐。他告訴我為了符合社會需求和輿論，法律現在每兩三年就修訂一次。法律對文化資產的定義越來越廣泛。除了古蹟以外，還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等分類，而且每個分類包含的範圍也隨時更動。比如認定歷史建築時，現在不只考慮建築本身，而且也考慮到曾經住過的人。²⁷ 鍾永豐局長跟我講了一個有趣的案例（他喜歡用「戰場」這個詞形容每個案例，因為通常辯論都非常激烈）。俞大維故居，位於溫州街 22 巷 4 號。該屋以前曾經被資產委員會審查過，結果連漢寶德都覺得房子本身的文化價值不夠資格，但是 50、60 年代國防部長俞大維居住時，曾廣邀海內外各界名人到此聚會，所以因為豐富的人文歷史而重新審查，最後被認定為市定古蹟。²⁸ 北投張學良故居（現在稱為「少帥禪園」）是另外一個例子。其不只是因為建築是日治時代有代表性的旅



（由左至右）臺南林百貨（Tainan Hayashi Department Store），建於 1932 年，重慶南路一段的星巴克（Starbucks on Chongqing South Rd），建於 1899 年，大溪老茶廠（Daxi Tea Factory），建於 1926 年

- 22 王美霞，《熱戀林百貨，熱戀臺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8），頁 2-5。
- 23 此現象符合戴錦華討論 21 世紀初上海對租界時代商業化的消費理論，亦即懷舊租界時期的產品和氣氛是最大的賣點。Dai Jinhua, "Imagined Nostalgia," i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6。
- 24 Hoshihisa Amai, "Pro-colonial or Postcolonial? Appropri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Heritage in Present-day Taiwa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0.1 (2011): 45-46.
- 25 高名孝、蔡瑞麒，《台灣建築地圖 VOL.01》（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2018），頁 55。
- 26 引自星巴克網站：https://www.starbucks.com.tw/stores/special/stores_special_chong-qing.aspx（擷取日期：2019.7.16）。
- 27 訪問於 2018 年 10 月 9 日在臺北市府進行。法律最新版本，請參閱臺灣文化部的網站：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306_19723.html（擷取日期：2019.7.11）。
- 28 〈「俞大維故居」列市定古蹟 接下來將申請國定古蹟〉，《自由時報》，2017.11.13，<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52022>（擷取日期：2019.7.13）。

社，也是因為張學良在中國近代史扮演重要角色，還加上此地有二戰時期是日本神風特攻隊出任務前最後享樂的地方，所以翻修後這棟建築變成大陸客最愛的觀光點之一。²⁹

通過這些例子我了解到，翻修日治時代建築並不一定跟日治時代的歷史有關，而也可能是跟後來臺灣的歷史有關，因為很多戰後來臺灣的人跟這些建築有特殊的感情。臺灣電影提供了不少相關例子。侯孝賢導演在他 1985 年的半自傳電影《童年往事》是其中之一。電影裡的家庭雖是外省人卻住在日式房子裡。另外，2018 年秋，我參觀新翻修的日治時代鐵道部廳舍時，導覽指出，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開場就在二樓的走廊和大廳拍的。因為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利用了很多日治時代的建築，尤其是政府機關級學校，當然在外省人的生活扮演相當的角色。總而言之，翻修日治時代建築的動機非常多而且非常複雜。

四

最後的錯誤也是最令我意外的，可能也是最有趣的。鍾局長邀請我參加每個月開一次，由官方、學者專家和民間團體代表所組成「文化資產審查會」。³⁰ 他建議我一定要參加 11 月的會議，因為可以目睹一場非常激烈的戰爭。那天，審查委員會決定臺大鹿鳴堂的未來。³¹ 鹿鳴堂不是日治時代的建築而是於 1968 年建在臺大校園內，名字又叫僑光堂，因為這棟樓專門是為了

給有貢獻的華僑或者來臺灣學習的華僑舉辦活動用的。後來臺大崑曲社也使用過。臺大校方原想把它拆掉改建新宿舍。他們覺得建築根本沒有保留價值，但是很多學生，臺大華僑畢業生，還有歷史學者都認為鹿鳴堂是一定要保留的。當天我目睹了生動的臺灣民主：會議室外有幾個臺大師生為保存鹿鳴堂在示威遊行，而會議室內經過激烈的辯論，審查委員最後通過投票決定把它列為「歷史建築」。³² 我原來要專注於日治時代建築，但是現在發現臺灣人已經對所有有歷史意義的建築都有強烈情感和保留的意願。

我個人認為保留鹿鳴堂是對的。如此就符合我原本要比較柏林和臺北的目的。鹿鳴堂的救援行動讓我想起柏林的一個歷史損失，也就是曾為東德人民議會的共和國宮（Palast der Republik），是在 1976 年、以當時東德流行的現代主義風格設計建造的。建築有大禮堂、美術館、餐廳、電影院等文化設備。很多東德人民和不少的西德民眾都覺得這棟建築雖然醜，但是有保留的歷史價值，因為它代表一個那個時候已經消失的政權。無論如何，德國聯邦議會於 2003 年決議拆除共和國宮。雖然官方的藉口是建築有石棉污染之虞，但是最大的原因當然是政治。當時的政府想要去除所有跟社會主義政權相關的代表物。³³

我覺得拆掉共和國宮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們對後代有責任，而東德社會主義的歷史也是 20 世紀德國動蕩不安歷史重要的部分。保留鹿鳴堂證明現在的臺灣大眾承認，無論是清朝、殖民地時代、戒嚴時代，只有保留

29 〈少帥禪園菜譜 幽居提味〉，《中時電子報》，2017.5.21，<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1000348-260107?chdtv>（擷取日期：2019.7.13）。

30 細節請參考文化部「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之第五條：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309_20047.html（擷取日期：2019.7.13）。

31 FN 29 會議記錄請參考臺北市府文化局的連結：<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content/cultureDownListAction.do?method=viewDownloadList&subMenuId=103012350&siteId=MTA1>（擷取日期：2019.7.13）。

32 〈校友搶救成功 台大鹿鳴堂獲登錄歷史建築〉，《聯合新聞網》，2018.11.30，<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510899>（擷取日期：2019.7.13）。

33 我只講了故事的一半：共和國宮的原址為始建於普魯士時期的柏林城市宮（Stadtschloss），城市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破壞，並在戰後的 1950 年被東德當局以「象徵普魯士式的帝國主義」為理由而拆卸。共和國宮拆掉後，柏林市政府花一大筆錢重新建造原來的城市宮。諷刺的是，他們拆掉的動機跟東德的一模一樣。石棉雖也是一個因素，但是石棉是可更換的。See also: Thomas Rogers, "Symbol of a Brutal Regime? Or a Fun Place to Part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19. <https://www.nytimes.com>

歷史的整體 (the sum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才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創造新認同，規劃未來。德國對保留東德時代的建築的輿論也慢慢改變了。越來越多人承認這些建築也是該保留的，一個好例子：師之家 (Haus des Lehrers) 是一座柏林建築，位於亞歷山大廣場附近。亞歷山大廣場是東德時代東柏林的市中心。該建築在東德時期建造，1964 年完工。其最著名的特色是外牆的壁畫，標題是「我們的生活」(Unser Leben)，描繪了東德社會中不同的職業群體，也是代表有濃厚社會主義風格的藝術。³⁴

柏林除了經歷了社會權威主義當然還經歷了納粹獨裁主義。如何面對和處理納粹時代留下來的代表建築，在 90 年代同樣開始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目前德國財政部是個好例子。該建築建於 1936 年，以前是由納粹黨政軍領袖赫爾曼·戈林 (Hermann Göring) 所領導的飛航部所在。當時是歐洲最大的辦公大樓，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納粹建築。戰後，東德政府開始使用 (當然是先把所有納粹徽章去除)。東西德統一後，被翻修為財政部 (Finanzministerium，建築也稱為 Detlev-Rohwedder-Haus)。

在 80 年的歷史中，建築被三個不同的政府使用。裏外有很多看板，介紹建築動盪的歷史。³⁵ 柏林類似的例子不少。1998 年，柏林市民為柏林奧林匹克運動場 (Olympiastadion) 的存廢問題掀起一場爭論，有些意見認為應該拆卸重建，有人則認為因為場館本身就是納粹黨最重要的象徵之一而主張保留。當局最後決定保留及改建場館。³⁶ 納粹和東德的歷史是必須保留的，無論多麼痛苦、多麼令人慚愧，這些歷史造就了今日的德國。

說到痛苦、令人慚愧，得提此最後一個例子，亦即前法本公司大樓 (I. G. Farben Haus)。該棟大樓建於 1930 年，採用前衛現代主義的新即物主義 (Neue Sachlichkeit) 風格。它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化學公司的總部，也是當時歐洲最大的辦公大樓之一。在納粹黨奪權後，法本公司開始與納粹政權合作，並提供齊克隆 B，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納粹用於執行種族滅絕的毒氣。戰後被打敗納粹的美軍使用了 50 多年，東西德統一，美國撤軍後，由法蘭克福市政府收回。經過是否拆除的討論，最後決定改成法蘭克福大學的新校區。³⁷



(左圖) 法蘭克福前法本公司大樓 (I.G. Farben Haus)，建於 1930 年，(右圖) 臺灣教育會館 (現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 National 228 Memorial Museum)，建於 1931

com/2019/06/07/arts/palast-east-germany-kunsthalle-exhibit.html (retrieved on July 14, 2019)。

34 引自師之家的官方網站：<https://www.hausdeslehrers.de/en/history/> (擷取日期：2019.7.14)。

35 引自財政部官方網站：https://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Web/DE/Ministerium/Geschichte/Geschichte_des_Detlev_Rohwedder_Hauses/geschichte_des_detlev_rohwedder_hauses.html (擷取日期：2019.7.14)。

36 引自柏林市官方網站：<https://www.berlin.de/en/attractions-and-sights/3560924-3104052-olympic-stadium.en.html> (擷取日期：2019.7.14)。

37 Peter Loewy, *IG-Farben-Haus* (München: Kehayoff, 2001).

一個不足 100 年的建築就能反映這麼多歷史！其他國家，好像只有臺灣能看到經歷過那麼動盪歷史的建築。譬如，日治時代臺灣教育會館，一方面是殖民地時代的象徵，另一方面是 30 年代建築現代主義的代表，戰後戒嚴時期做為臺灣議會臨時的集會場所。1995 年美國駐臺灣新聞處遷入本建物，也成為反共宣傳總部，戒嚴時代結束後為中國童子軍總部使用，2007 年經行政院核定成為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³⁸

結 論

臺北的建築歷史和柏林真的有很多共通點。惠森在 2003 年出了一本影響力很大的專門討論城市建築和歷史回憶和解讀的書，書名為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他說柏林像一個 Palimpsest，意思就是擦去原文重寫的書，隱喻好幾次被覆蓋的歷史需要仔細還原，而且有可能也必須加上新的註解和分析才能有全體的概念。³⁹ 我覺得臺北就像這樣的 Palimpsest，而且日治時代的建築就是這個 Palimpsest 的其中一層。解讀 Palimpsest 我們才能還原所有的真相，而且理解現實。臺北日治時代建築變成了一個影響文化和國家認同的重要指標。這些老建築不是永恆不變的歷史遺跡，而是不停變化意義的場所。我做研究的時候，親自體驗，這些老建築如何讓民眾結合一起保留歷史、如何激發年輕人學習歷史、如何讓不同地區的國民紀念當地的事件和人物、如何吸引遊客、如何美化都市並把都市多元化、如何讓臺灣人實踐民主並讓我們不禁提出許多關於歷史和現實的複雜問題。

像這樣多次被覆蓋的歷史的日治時代建築，臺北最典型的範例就是 2016 年新開張的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原臺北北警察署）。建築建成於 1933 年，原為日本殖民地政府控制臺灣人的象徵，且建造時使用的石塊，部分來自當年拆除的臺北牆。1945 年後，臺北北警察署

改為刑警總隊。⁴⁰ 翻修後的建築則展示了殖民地時代黑暗之處，包括拘留政治犯的扇型拘留所及水牢。同時紀念館也展示臺灣 20 年代至 30 年代文化的繁華和反殖民運動，例如：「黃金年代的光與影」和「臺灣新文化運動」展區。⁴¹ 1949 到 1958 年該拘留所也曾作為關押白色恐怖政治犯的監獄使用，所以也觸及了戒嚴時代的滄桑。⁴² 該建築現在令我們反思這些複雜的歷史，而且表現臺灣日治時代建築在當今臺灣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輿論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亦影響著臺灣人對未來的憧憬。

總結，雖然犯了三個錯誤，我原來的假設好像也不是完全錯的。對日治時代翻修建築的論述並不是一種贊同過去時代的實現，而是一個很複雜的文化論述，而通過這個論述，臺灣人能辯論臺灣在全球化經濟的地位和臺灣文化的多元化。翻修日治時代建築的過程，把臺灣和其他如德國等通過老建築來探索動盪歷史的國家聯合在一起。鍾局長之前跟我說，我很幸運沒有把當代臺灣日治建築當作博士論文題目，因為絕對寫不完。我想他很有道理，整個題目比我想像複雜的多了，但是我還是很高興做了這些淺薄的研究，因為以後就有更多理由來臺灣繼續做日治時代建築翻修過程的研究。



臺北北警察署（現今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Taiwan New Cultural Movement Memorial Hall），建於 1933

38 高名孝，蔡瑞麒，《台灣建築地圖 VOL.01》，頁 31。

39 Andreas Huyssen,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2-84.

40 高名孝，蔡瑞麒，《台灣建築地圖 VOL.01》，頁 57。

41 引自文化運動紀念館官方網站：<https://tncmmm.gov.taipei/>（擷取日期：2019.7.16）。

42 引自不義遺址資料庫：<https://hsi.nhrm.gov.tw/home/zh-tw/injusticelandmarks/126856>（擷取日期：2019.7.19）。